

赞扬第二卷：与帝国主义共舞

在这本书中，Moncourt与Smith为我们这些正在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可怕情况作斗争的人提供了一些“组织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这样的组织性记忆是迫切需要的。

他们提醒我们，一代人之前，一位德国RAF的政治囚犯写道，世界正面临着“......法西斯主义不再需要大规模动员有意识形态动机的法西斯分子，而仅需要为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官僚和技术专家”。

这是一个在一代人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充分动员起来的政治观察。

在这里，Ward Churchill也让我们看到，对于那些在同一时期在美国与同样的力量作斗争的人，我们没有做足够的工作来提供类似的组织记忆。在美国，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的8万名被隔离囚犯在最初为摧毁政治犯而设计的地狱般的条件下受苦，反对监狱隔离的斗争受到了阻碍，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些知识将迫使美国囚犯认识到，他们的斗争需要政治而不是“法律”的解决方案。

Moncourt与Smith还提醒我们，在以德国为中心的斗争中，妇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广泛而勇敢的作用，甚至让我惊呆了，因为我对这方面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一个认识是，如果父权制条件可以蒙蔽一个与这些同样的力量斗争了40多年的人，那么我们都必须加紧努力，把摧毁父权制和所有形式的性别压迫与克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的斗争放在同一水平上。

——Russell “Maroon” Shoatz，美国政治犯

《与帝国主义共舞》是红军派纪实三部曲中的第二卷，继续挖掘1970年代和1980年代德国革命左翼的迷人历史。它有力地将红军派置于更广泛的革命政治和世界事件的轨迹上。它为我们讲述了激进分子在斗争中与警察、监狱、线人、媒体以及彼此怎样接触以及可能怎样接触的内部故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一个全球性的故事，也是今天的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Dan Berger，《The Hidden 1970s: Histories of Radicalism》的编辑

“红军派的斗争始终以全球力量平衡和大都市的冲突为基础。战争不仅仅是在最发达的部分让事态升级；相反，它是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现实，并将一直持续到胜利。

——布丽吉特·莫恩豪普特

前言

你手中的这本书，连同它的其余几卷，构成了有史以来以英语世界出版的最完整的红军派文本和历史集。

我们在2009年出版的第一卷《人民的炮弹》试图提供一部对今天参与激进社会变革运动的人来说既有趣又有用的红军派历史。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是独特的，因为关于RAF的英文研究几乎都是从反叛乱的角度撰写的，其目的是诋毁游击队，不承认它是一种正当的政治力量；简而言之，剥夺我们的历史。实现这一目的的有利手段是将有关的个人病理学化，将1970年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游击队斗争的经验简化为少数精神不正常的人、“被宠坏的小青年”，甚至可能是希特勒后代的工作。即使是那些不致力于反叛乱目标的研究也受到这种背景的影响，由于缺乏关于RAF的准确信息，以及游击队的著作几乎没有英文版，这种情况很容易影响更广泛的话语。

我们的第一卷是对这种情况的补救，我们希望我们制作的东西在这方面至少是有点效果的。RAF的经历，以及国家为消灭他们所做的努力，远非仅仅是历史的遗迹，在今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最明显的例子是，无休止的“反恐战争”提供了一块遮羞布，背后是一次又一次美国政府能够入侵和破坏世界各国的稳定。但是，RAF的历史在今天仍然非常突出，因为西德刑事当局开发的试图击垮革命者的方法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吞噬人们生活的怪物，这些人可能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像施塔姆海姆这样的地方。我们指的是在世界各地的监狱中广泛使用的单独监禁，或“隔离酷刑”，但特别是在美国，在任何一天都可能有多达十万人遭受这种非人的条件。一些囚犯被这样关押了几天或几周；另一些则在隔离中度过了几十年。正如RAF囚犯在这些条件首次被用来对付他们时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社会性的灭绝计划。它是一种心理谋杀的形式。

我们一些最热心的读者曾在美国的监狱中被关押在这些条件下，这并不完全令人惊讶。他们不难理解监狱条件的现实，这些条件是专门为施加“干净”的酷刑而设计的，在摧毁人的同时在身体上不留伤痕。



当我们开始这个系列时，我们打算写两本关于RAF的书，叙述的明显突破点是1977年。（大多数作者和电影宣传者只是假装该组织从那之后就不存在了）然而，在我们开始第二卷的工作后不久，我们就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鉴于RAF在20世纪90年代自行处理其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书面文件，两本书根本无法容纳太多内容。本项目将需要第三卷。

如果说把RAF的叙述分成两部分所产生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将其分成三部分，问题就不那么明显了。对于1986年，即“前线”最终结束、暗杀时代开始的时候，或者甚至1992年，即该组织决定单方面缓和局势的时候，都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点。然而，我们选择了1984年，这使得我们能够将这一系列三卷中最短的一本书，用于研究RAF和其他左翼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一个非常具体的重新定位（reorientation）的阶段。

这一卷研究了七年的困难时期。我们的叙述开始于游击队迄今为止最大的失败之后的时刻，即1977年争取囚犯自由的尝试失败了。这只是当时所有从1960年代激进左派出现的运动和倾向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一切都有待商榷，就游击队而言，这些问题更加紧迫，因为奉行导向了失败的战略的后果可能更加可怕。

重新评估，正视错误，解决自己队伍中的弱点，在不利条件下试图找到新的立足点，在不同战略间的紧张关系中找到正确航向——这些都是本卷的主题。这并不总是一个愉快的故事。然而，我们希望它会被证明是一个有用的故事。



本卷的目的是独立存在。虽然我们设想读者会想尽一切办法了解RAF的构成性（formative）思想和和经验，以及他们的思想在头七年是如何发展的，但人们不需要读过《人民的炮弹》，就能欣赏《与帝国主义共舞》中讲述的故事。在必要的地方，我们引用了第一卷的内容，为理解某个特定的问题或议题提供必要的背景，因此，你应该可以从目前手中的书中理解从1977年到1984年的故事。

那些读过第一卷的人，对它仍然记忆犹新，可以选择跳过我们的第一章，这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对之前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特意在这一章中加入了我们以前没有加入的观点和看法，以使那些选择从第一页开始阅读的人的努力是值得的。

我们希望，我们的第三卷，应该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候出现，将为这个故事画上句号。“我们希望”这一表述并不是随意使用的，因为近年来，德国政府已经证明了自己渴望让RAF的故事保持活力并发展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2012年，对前RAF成员Verena Becker进行了新的审判，该案与对1977年总检察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的谋杀案有关。在此之前，联邦德国还对其他前RAF成员进行了法律威胁，试图胁迫他们提供有关其过去活动的细节。除了纯粹的报复，还有政治和历史学方面的原因，即创造一个对国家来说可接受的历史叙事，这一切的背后是国家的动机。正如一些前RAF成员在2010年的一份声明中解释的那样：

根据其对全球政治局势变化的评估，RAF于1998年解散了。这是它自己的决定，而且它没有被国家打败，显然它仍是一根肉中刺。因此，[对国家来说]这是“神话”仍未被摧毁的永恒叹息。因此，它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和道德上下跪屈服。因此，它试图最终将我们的历史定性为犯罪，一直到它提出“真相委员会”的虚伪建议。当搜捕那些仍在地下活动的人、媒体上的诽谤运动和针对前囚犯的法律程序仍在继续进行时，我们被期望于公众面前叩首谢罪。由于这么多年来，[我们]“放弃[斗争]”并未凑效，而我们现在[被国家]要求互相谴责。若还有可能的话，你们自救吧。1

本卷是为了纪念Christa Eckes，她是在对Becker的审判中被要求出庭作证的人之一，但她拒绝了。尽管她当时正在与一种特别严重的癌症作斗争，并受到了威胁，若她不服从，就会被强制关押在牢房中。Eckes坚持自己的立场，最后国家被迫退让。这种拒绝告密的行为，这种拒绝背叛自己原则的例子，是Eckes送给我们大家的最后一份礼物。她于2012年5月23日死于癌症。

1 红军派的一些前成员。“关于目前情况的说明——由一些在不同时间点上曾是红军派成员的人撰写”，2010年5月。中括号里的内容是补译的——中译者

关于武装斗争的必要性：对红军派和前进问题的思考

Ward Churchill

**再也离不开步枪了。**（*Never again without a rifle.*）

——意大利左派口号（约1970年）

从据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有利地位回顾过去，很明显，我们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中声称要严肃地废除现行秩序的人，到1970年已经知道了一些现在已经被遗忘的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已经被扔进了积极否认的黑暗深渊。其中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主义体系，我们所处的严重不平等的社会就不可能以目前的形式存在，1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构成了帝国主义建立和赖以生存的真正基石，2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影响本质上是灭绝性的。3

同样清楚的是，不可能存在有效的依据让人能把这个问题搪塞过去。面对被恰当地描述为“无与伦比的罪行（the incomparable crime）”4的系统性犯罪，我们有义务——在道德上和法律上，个人上和集体上——通过任何和所有可用的手段进行干预。在这一点上，没有旁观者。正如Karl Jaspers在纳粹时代对所谓的“德国好人”所观察到的那样，那些对种族灭绝过程假装视而不见的人，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想通过争辩这些过程不是“真实的”，从而逃避对抗这些过程的重任，这些家伙可以被正确地视为犯罪本身的帮凶。5

显然需要采取具体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见证”种族灭绝没有任何用处（也就是能让见证者自称对众所周知的德国好人有微弱的道德优势）。6与此相关的是，“对权力说真话（speaking truth to power）”的概念（好像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不知何故没察觉到他们运用权力方式造成的影响）本身就能纠正这种情况——这个命题不过就是个神话。7当然，通过选举政治来追求实质性的改变，早已显示出它不过是一种炼金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手淫。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被当权者正式允许甚至批准的异议形式——游行、集会和其他受国家批准的抗议方式（无论它们的规模如何）。8事实上，发达国家采取“镇压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9姿态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前景：大规模参与非暴力公民抗命的仪式会严重损害正常商业活动。10当然，神圣的安工团式（anarcho-syndicalist）大罢工处方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像1968年春天在法国做到的那样，11哎呀，但是很可惜，历史上没有任何例子表明，在明确的反帝国主义基础上，或者更狭义点说，在反对某一特定的种族灭绝的问题上，在哪里有可能组织起这种行动。12

这并不是说上述一系列方法完全没有价值或效用。恰恰相反，每一种方法都在一系列的策略和技巧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些策略和技巧是为了激发民众的意识，并因此进行政治动员，这对改变现状至关重要。然而，即使在所有因素都存在并或多或少地协同运作的情况下，历史的结果还是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换句话说，过去和现在都要求着更多的东西。在这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迄今为止，技术先进的国家所制造的种族灭绝进程得到制止的唯一例子涉及到大量的——通常是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的应用。

最显着的例子无疑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它们的帝国野心和对不同臣民坦率的灭绝政策在二战期间被武力无条件地终结了。13其他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1959年古巴游击队驱逐美国的附庸政权；14阿尔及利亚持续发动游击队运动，在1962年驱逐了法国殖民主义；15持久的越南人民战争首先打败了法国（1954年）然后美国（1975年）；16游击队运动使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分别在1973年、1974年和1975年摆脱了葡萄牙的统治；171979年尼加拉瓜游击队消灭了另一个美国附庸政权；18以及1988年纳米比亚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民族解放战争获得成功。19

尽管在许多人都认为英国在战后放弃对印度的统治——在1940年至1944年间表现出真正冷酷的种族灭绝20——是通过甘地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计划实现的，但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21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不仅有重要的武装方面，22而且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甘地的努力肯定会失败。简单地说，对前面提到的德意日三国同盟发动的全面战争已经耗尽了英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以至于帝国根本没有能力维持对次大陆的控制。23更何况，英国还同时面临着其他殖民地的武装解放斗争，特别是马来亚（今马来西亚）、肯尼亚，以及稍晚些的亚丁（也门）。24

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民族解放都没有产生那些为实现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人所希望的结果，即使在最成功的情况下，消除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充其量也只是暂时的。造成这一令人沮丧的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除了1945年其他工业/技术发达的国家对三方列强的粉碎之外，帝国秩序只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殖民地而不是殖民宗主国被强行废除。25除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每个殖民宗主国都迅速重组、重建，并恢复了其在国际等级制度中的“合法”地位——帝国的中心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26

这使得帝国主义能够吸收，甚至在许多方面乐于拆掉其经典的海外殖民主义体系，转而支持一种更精致、更有利可图、更种族灭绝的新殖民统治模式，现在其支持者相当矛盾地将其描述为“全球自由市场”和“完全一体化的全球经济（fully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y）”。27因此，消除帝国主义不能被视为一个仅通过在殖民地腹地取得武装斗争成功就能实现的目标，这个观点曾经而且仍然被大都市中太多自称的反帝人士所接受。28相反，它必须在大都市本身中实现。唯一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理想的情况是，用类似于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第八航空队在二战期间把第三帝国炸得灰飞烟灭的那种手段，让**全部的**帝国中心都遭受同样的命运，29从而阻止这个体系以某种更反动的方式得到重建。不幸的是，这一情景，连同那些想把苏联红军（摧毁了德国军队并攻克了柏林30）或越南人民军（与50万美军战斗过，不仅使敌人停滞不前，而且在战场上瓦解了对方31）的一个形象化对应物变为现实的情景，都属于纯粹幻想的范畴。

然而，正如人们在1970年之前所了解的那样，游击战——最初由爱尔兰共和军（IRA）在20世纪初实行，后来专门为城市环境而演变的那种——提供了相当大的潜力。32至少，它有助于为反帝国主义提供有力表达。最重要的是，对于那些被诺姆·乔姆斯基在1968年描述为“隐蔽发展的艾希曼主义（creeping Eichmannism）”33的大都市官员来说，这消除了他们自以为不会遭报应的感觉。在“后方”进行武装斗争的背景下，与正在进行的反人类罪同谋的小艾希曼们几乎不会怀疑他们的行为随时可能招致有形的惩罚，包括物质上的，至少是潜在的个人惩罚。34

因此，在1969年至1973年期间，大都市中严肃的反帝国主义者开始在从美国到西欧和日本的各个地区实施城市游击行动。35虽然有时会出现大量相互对立的策略，而且结果也是好坏参半，但在这一努力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组织和倡议。这些组织和倡议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别，但又相互重叠，而且经常相互影响：

* 美国的地下气象员组织（WUO）、乔治·杰克逊旅（GJB）和联合自由阵线（the United Freedom Front (Sam Melville/ Jonathan Jackson Brigade)）36，意大利红色旅（Brigate Rosse）37，法国的国际革命行动小组（Groupes d’action révolutionnaire international，GARI）和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AD）38，以及德国的红军派等组织，以一种有机结合于并针对他们本国的国家/公司机器（state/corporate apparatus）的方式产生。
* 产生于被帝国主义政权吸收了的殖民地的组织，在“母国”本身的边界内开展行动，目的是推动其各族人民的去殖民化斗争。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西班牙的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巴斯克解放军（Euskadi Ta Askatasuna，ETA）39；加拿大的魁北克解放阵线（the Front de libération du Québec）40；以及美国的黑人解放军（Black Liberation Army，BLA）与波多黎各民族解放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Puertorriqueña，FALN）41。在很大程度上，临时爱尔兰共和军（the Provisional IRA）42为使Ulster（北爱尔兰）摆脱英国统治而开展的游击战也属于这一类别。
* 像日本赤军（JRA）和德国的革命细胞（RZ）其中之一部分这样的组织，虽然产生于特定的大都市，但采取了一种“国际主义”的立场，导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赤军而言，完全是在他们的祖国之外，在全球范围内针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公司机器而活动43。通常，这类团体直接与第三世界的游击队组织（特别是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对外行动），PFLP(EO)）开展合作，并经常以其为主导。44

虽然上面提到的每个组织都值得深入研究和分析，但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个组织得到了研究。这个问题绝不是单纯的学术兴趣。只有通过对它们的历史进行实质性的挖掘，才能从它们千差万别的经历中吸取教训，纠正它们的错误，并在大都市中实现更好的武装斗争实践。

在此，J. Smith和André Moncourt为提供具有权威的关于RAF的考古学而做的持续努力值得特别赞扬。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史密斯和蒙考特的作品堪称典范，还因为RAF作为殖民地母国民众潜力之象征而具有独特的重要性。

有了这样的材料供我们使用，不仅应该证明有可能克服掉那些声称从大都市内部反对帝国主义的人当前所表现的惰性，而且这次我们也许能把它做对。

注释

1. 关于这一点的全面概述，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巨著*The Modern World-System,* 4 vo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the first three volumes wer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Academic Press in 1974, 1980, and 1989, respectively).
2. 有相当多的文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据我估计，Aimé Césaire’s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5), Eduardo Galeano’s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and Walter Rodney’s *How Europe Underdeveloped Africa* (Baltimore: How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仍然是最好的阐释之中的。
3. 将殖民主义等同于种族灭绝是让·保罗·萨特在为1967年罗素法庭（Russell Tribunal）准备的一篇关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的文章中首次提出的，最初以“论种族灭绝（On Genocide）”为题发表在*Ramparts*（1968年2月），pp. 35-42。在某种程度上，这篇文章后来以短书的形式发行——见Jean-Paul Sartre and Arlette El Kaim-Sartre, *On Genocide and a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and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8)——并被收入法庭的出版记录中；见John Duffett, ed., *Against the Crime of Silence: Proceedings of the Russell 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 (New York: Clarion, 1970).
4. See Roger Manvell and Heinrich Fraenkel, *The Incomparable Crime: Mass Extermin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G.P. Putnam’s Sons, 1967).
5. Karl Jaspers, *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1; reprint, New York: Dial Press, 1947).
6. 关于相反主张的一连串冗长标准，见James Dawes, *That the World May Know: Bearing Witness to Atroc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这种普遍存在的假设框架中，典型地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傲慢。参见Kerry Kennedy and Eddie Adams, *Speak Truth to Powe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Who Are Changing Our World* (Brooklyn, NY: Umbrage Editions, 2000).
8.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69年10月至11月，反对越南战争的“暂停示威（Moratorium demonstrations）”失败了，据可靠估计，约有200万人参加了这一活动，甚至未能阻止尼克松政府在几个月后将地面作战扩大到柬埔寨。See “1969: Millions March in US Vietnam Moratorium,” *BBC News: On This Day, October 15* (http://news.bbc.co.uk/onthisday/hi/dates/stories/october/15/newsid\_2533000/2533131. Simon Hall, *Rethinking the American Anti-War Move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119-136; Keith William Nolan, *Into Cambodia: Spring Campaign, Summer Offensive, 1970* (San Francisco: Presidio Press, 1999).
9. 关于有争议的概念，见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Repressive Tolerance,” in Robert Paul Wolff, Barrington Moore, Jr., and Herbert Marcuse, *A Critique of Pure Tolerance* (Boston: Beacon Press, 1965), 95-137.
10. 例如，考虑到1971年反对印度支那战争的五一游行，其间大约有两万人参加了在美国首都举行的蓄意破坏性的、但基本上是非暴力的公民抗命的协作计划。现在大部分人都忘记了，五一劳动节对尼克松政府的政策没有明显的影响，甚至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也是如此。See Lucy G. Barber, *Marching on Washington: The Forging of an American Tradi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04- 213; William Shawcross, *Sideshow: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11. 关于总罢工的概念，see, e.g., Ralph Chaplin’s 1933 essay, “The General Strike,” collected in Lenny Flank, ed., *The IWW: A Documentary History* (Athens, GA: Red and Black, 2007), 185-212; Milorad Drachkovitch, *The Revolutionary Internationals, 1864-1943*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83-100. On the strike in France, see, e.g., George Katsiaficas,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ew Left: A Global Analysis of 1968*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9), 87-116.
12. 这其中的原因无疑是多样而复杂的。然而，就北美而言J. Sakai在*Settlers: The Mythology of the White Proletariat* (Chicago: Morningstar Press, 1989) 中对这一问题作了大量的说明。
13. 德国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但见Mark Mazower, *Hitler’s Empire: How the Nazis Ruled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2008).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种族灭绝行为，见e.g., 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关于意大利殖民主义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种族灭绝影响这一相对被忽视的话题，见Alberto Sbacchi, *Legacy of Bitterness: Ethiopia and Fascist Italy, 1935-1941* (Lawrenceville, NJ: Red Sea Press, 1997); Rory Carroll, “Italian Atrocities in World War II,” *The Guardian,* June 24, 2001 (http://www.guardian.co.uk/education/2001/jun/25/artsandhumanities.highereducation
14. See generally, Aviva Chomsky, *A History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New York: Wiley- Blackwell, 2010).
15. 虽然作者的偏见很明显，但英文世界中现有最好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史可能是Alistair Horne’s *The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7; rev. ed. published by the History Book Club, 2002).
16. See Marilyn Blatt Young, *The Vietnam Wars, 1945-1990*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1).
17. 关于几内亚比绍, see Gérard Chaliand, *Armed Struggle in Africa: With the Guerrillas in “Portuguese” Guine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Patrick Chabal, *Amilcar Cabral: Revolutionary Leadership and People’s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关于莫桑比克, see Thomas H. Henriksen,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Mozambique’s War of Independence, 1964-1974*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3). 关于安哥拉, see John Marcum, *The Angolan Revolution,* 2 vol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9 and 1978, respectively).
18. See, e.g., Carlos M. Vilas, *The Sandinista Revolution: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Central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6).
19. 关于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英文资料很少，but see John Ya-Otto, Ole Gjerstad, and Michael Mercer, *Battlefront Namibia* (Chicago: Lawrence Hill Books, 1986); Fen Osler Hampson, *Nurturing Peace: Why Peace Settlements* *Succeed or Fail* (Washington, DC: U.S. Institute for Peace, 1996), especially pages 53–64.
20. 英国故意在孟加拉和东印度其他地区诱发了严重的饥荒，他们抽走了维持人口所需的粮食，并将其囤积在英国，作为战后物资匮乏的对冲。估计有三百万人因此而死亡。See Madhusree Mukerjee, *Churchill’s Secret War: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Ravishing of India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21. 印度的独立是通过甘地的非暴力实现的，这种说法被一些有见识的分析家恰当地驳斥为“舒服的虚构”（“comfortable fiction”）。例如，见Alex Von Tunzelmann, *Indian Summer: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End of an Empi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8. 对围绕甘地和平主义的神话的良好驳斥，见Faisal Devji, *The ImpossibleIndian: Gandhi and the Temptation of Viol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22. See Peter Ward Fay, *The Forgotten Army: India’s Armed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42-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23. See generally, Roy Douglas, *Liquidation of Empire: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eter Clark, *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hurchill,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the Pax Americana*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08).
24. 马来亚游击队所称的反英解放战争并没有直接成功。尽管如此，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占用了英国相当大的军事资产。See Anthony Short, *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 (New York: Frederick Muller, 1975). 在肯尼亚，平息所谓的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需要英国在这一时期投入更多的力量，见Caroline Elkins, *Britain’s Gulag: The Brutal End of Empire in Kenya* (London: Pimlico, 2005). 尽管文笔相当呆板，但关于也门民族解放战争最好的英文资料可能是Vitaly Naumkin’s *Red Wolves of Yemen: The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Cambridge, UK: Oleander Press, 2004).
25. 同样，有大量的文献记录了这一结果并分析了其原因。关于一个有点肤浅但却有用的总结，见Vijay Prashad, *The Darker Nations: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26. 关于德国、意大利和西欧，请参阅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1947-195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Nicolaus Mills, *Winning the Peace: The Marshall Plan and America’s Coming of Age as a Super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2008). 关于日本，参见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 Japan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W.W. Norton, 2000), especially pages 526–547.
27. 对于这一领域开创性的工作，见Kwame Nkrumah, *Neo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66). 有关更多当前最新的评估，see Zygmunt Bauman,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Richard A. Falk,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A Critique*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99); Michel Chossudovsky, *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2003);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Picador, 2008).
28. 即使这样的策略是可行的，受益人口将这种斗争中带来的痛苦转移到被殖民者身上，此行径其道德和伦理影响不言自明。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种姿态在美国的反帝人士中一直都很明显。如需全面了解，请参阅Richard Seymour, *American Insurgents: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Anti-Imperialism* (Chicago: Haymarket Books, 2012).
29. See Alan J. Levine, *The Strategic Bombing of Germany, 1940-1945* (Westport, CT: Praeger, 1992).
30. 尽管英美两国在诺曼底登陆的决定性等问题上喋喋不休，但事实是，红军不仅在与德国地面部队的战斗中首当其冲，而且给德国人造成了更多的伤亡——大约占总数的80%，而不是西方盟军；William J. Duiker,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Stamford, CT: Cengage Learning, 2009), 128. 关于进一步的背景，见Chris Bellamy, *Absolute War: Soviet Russia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Macmillan, 2007).
31. See Richard Boyle, *Flower of the Dragon: The Breakdown of the U.S. Army in Vietnam* (San Francisco: Ramparts Press, 1972); Cincinnatus (Col. Cecil B. Currey), *Self- Destruction: The Disintegration and Decay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during the Vietnam Era* (New York: W.W. Norton, 1981).
32. 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运动，参见Peter Hart, *The IRA at War, 1916-192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到20世纪60年代末，乌拉圭的图帕马洛运动已经成为适应北美和欧洲环境的有用模板；见María Esther Gilio, *The Tupamaro Guerrillas: The Structure and Strategy of the Urban Guerrilla Movement* (New York: Saturday Review Press, 1973). 在这一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小册子是巴西专业人士卡洛斯·马里盖拉的《城市游击战迷你手册》（*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rilla*）(Berkeley, CA: Long Time Comin’ Press, 1969; reprint, St. Petersburg, FL: Red and Black, 2008).
33. Noam Chomsk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New York: Pantheon, 1968; reprint, Oakland, CA: AK Press), 277. 事实上，“creeping Eichmannism”一词的根源比乔姆斯基使用它早了近十年，最早出现在E.Z. Friedenberg’s *The Vanishing Adolescent* (Beacon Press, 1959). See Neil Postman,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urt Press, 1970), 9.
34. 关于这一论点的进一步发展，见“The Ghosts of 9-1-1: Reflections on History, Justice, and Roosting Chickens,” in my *On the Justice of Roosting Chickens: Reflection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U.S. Imperial Arrogance and Criminality* (Oakland, CA: AK Press, 2003), 5-38.
35. 这些工作在三大洲或多或少地同时开始，这几乎是一个偶然的问题。西欧——特别是德国——和美国的运动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互动；而SDS（“争取民主社会”——译注），也许还有美国的其他组织，在60年代末与日本的激进学生运动Zengakuren（全日本学生自治团体联合会——译注）有直接联系。See Martin Klimke, *The Other Alliance: Student Protest in 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Global Six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William R. Farrell, *Blood and Rage: The Story of the Japanese Red Army*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0), 90.
36. 关于WUO，see Dan Berger, *Outlaws of America: The Weather Underground and the Politics of Solidarity* (Oakland, CA: AK Press, 2005); Bernardine Dohrn, Bill Ayers, and Jeff Jones, eds., *Sing a Battle Song: The Revolutionary Poetry, Statements, and Communiques from the Weather Underground, 1970-1974*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6). 关于George Jackson Brigade, see Daniel Burton-Rose, *Guerrilla USA: The George Jackson Brigade and the Anticapitalist Underground of the 197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Daniel Burton-Rose, ed., *Creating a Movement with Teeth: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George Jackson Brigade* (Oakland, CA: PM Press, 2010). 目前还没有关于联合自由阵线的类似材料。
37. 尽管第一个资料来源不充分，第二个资料来源也很反革命，但见Alessandro Silj, *Never Again Without a Rifle: The Origins of Italian Terrorism* (New: Katz, 1979); Robert C. Meade, Jr., *The Red Brigades: The Story of Italian Terror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从活动家的角度来看，也可参见Chris Aronson Beck, Reggie Emiliana, Lee Morris, and Ollie Patterson, *Strike One to Educate One Hundred: The Rise of the Red Brigades in Italy in the 1960’s-1970’s* (Seeds Beneath the Snow, 1986), 其中部分内容可在 http://www.urbanguerilla.org/brigaterosse/index.php.
38. 没有关于GARI本身的英文资料，但关于其继承者，见Michael Y. Darnell, *Action Directe: Ultra-Left Terrorism in France, 1979- 1987* (London: Frank Cass, 1995). 请读者注意，这是一个明显的右翼资料。
39. See Robert P. Clark, *Negotiating with ETA: Obstacles to Peace in the Basque Country, 1975-1988*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0); Paddy Woodworth, *Dirty War, Clean Hands: ETA, the GAL and Spanish Democrac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40. 关于FLQ的最好的英文资料——内容并不算多——似乎是Louis Fournier’s *F.L.Q.: The Anatomy of an Underground Movement* (Toronto: NC Press, 1984).
41. 关于BLA的材料不多，但见Akinyele Omowale Umoja, “Repression Breeds Resistance: The Black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Radical Legacy of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and Russell Shoats, “Black Fighting Formations: Their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Potentialities,” both in Kathleen Cleaver and George Katsiaficas, eds., *Liberation, Imagination, and the Black Panther Par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3-19, 128-138. See also Dhoruba bin Wahad, Assata Shakur, and Mumia Abu Jamal, *Still Black, Still Strong* (Brooklyn: Semiotext(e), 1993); Jalil Muntaqim, *On the Black Liberation Army* (Montreal: Abraham Guillen Press/Arm the Spirit, 2002).
42. 尽管FALN在1974年至1983年间参与了“对芝加哥、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军事和政府大楼、金融机构和公司总部进行了120多次爆炸袭击” ，但几乎完全没有关于该组织的英文资料。一般来说，见Ronald Fernandez, *Prisoners of Colonialism: The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Puerto Rico*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4).
43. 关于Provos（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文献有很多（质量参差不齐）。Richard English在他的*Armed Struggle: The History of the I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提供了一个更有用的概述。Also see Gary McGladdery, *The Provisional IRA in England: The Bombing Campaign, 1973-1997* (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2006).
44. 日本赤军（JRA）不应与短命的日本赤军派（Japanese Red Army Faction）或其直接继承者联合红军相混淆，后者于1971年在日本自毁; see Farrell, *Blood and Rage,* 1-29. 关于革命细胞本身，目前几乎没有任何英文资料。
45. 虽然解放巴勒斯坦的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相当复杂，但PFLP（EO）特别采取了与非阿拉伯组织合作和支持的策略，以便在那些支持以色列定居者政权的帝国中心开展行动。关于背景，一般来说，见Yezid Sayigh, *Armed Struggle and the Search for State: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 1949-1993*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一、关于红军派的前情提要

四十年前，世界曾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共产主义和“自由西方”之间的分歧——尽管也有缓和的一面——将每一场政治冲突打上了烙印，反殖民主义革命也是如此，而反殖民主义革命还没有走到尽头。

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认为，冒着生命危险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手中争取解放是合理且值得的，他们加入了具有这些既定目标的运动。这场全球性的动荡在第三世界找到了它的中心，然而它的影响让任何一个国家无法保持不变。虽然在富裕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些革命运动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最为明显，但仍有一些抵抗组织、亚文化残余，这些人坚持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将斗争推进到70年代及以后。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团体——红军派（RAF）的故事。

西德，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是二战后为威胁苏联集团而建立的反共国家，帝国主义曾希望，也确实成功地包围着苏联集团重建了西欧的经济。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战后资本主义盟国立即决定与前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媾和，只要他们愿意与新的“民主”的主人玩得来。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德国的许多关键权力职位都由曾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扮演过类似重要角色的人占据。

作为对任何真正的去纳粹化的替代，宗教和民间领袖只是重复着这样的咒语：确保纳粹时期的罪行不再重演的最好方法是让所有德国人集中精力过“体面、守法的”生活。[青年]的父母——其中不少人衣柜里还有纳粹万岁礼（sieg-heiling）骷髅——经常向他们的孩子重复这一信息。

一种令人窒息的、专制的、循规蹈矩的意识形态正从上而下地强加于人，与战后被消杀过的文化荒地完美匹配，就像它被法西斯主义“雅利安化”了一样。

名为“新左派”的全球反抗浪潮在20世纪60年代袭击了联邦德国，就像它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的浪潮一样。西柏林的学生不仅开始质疑经济体系，而且质疑社会本身的性质。家庭、工厂和学校体制的结构都受到了挑战，因为这些年轻的反叛者将嬉皮士反文化风格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融合。

在1966年和67年，冲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衰退使联邦德国的失业人口在战后第一次超过了一百万人。为了防止异议，社会民主党（SPD）与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组建了所谓的“大联合”政府。由于所谓的“左派”与右派携手管理危机，任何真正的变革似乎只能在国家渠道之外发生。西德的年轻人在工厂和街道上感到失望，因为年轻的工人越来越被新的法团主义契约所边缘化，尤其是在大学里，这些大学一百多年来一直是右翼力量的堡垒。1议会外反对派（Außerparlamentarische，APO）诞生了。

公社和住房集体开始兴起。妇女在学生运动和议会外反对派中挑战男性的领导地位和路线，建立了日托所、妇女核心小组、妇女中心和妇女公社。更广泛的反主流文化、摇滚乐手、艺术家和毒品圈的成员都聚集到了新兴的政治叛乱中。政治抗议包括传统的示威活动，以及静坐、宣讲和“即兴事件（happenings）”。

鉴于当时西德保守的文化和政治状况，这一点更加引人注目。回过头来看，也许不难发现，学生起义是一个复杂的、常常是矛盾的社会转型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过程，资本主义不仅受到了挑战，而且也得到了更新，新阶级在旧阶级更新他们的世界观时崛起。然而，在当时，学生抗议者与周围社会之间的鸿沟似乎却几乎是无法跨越的。

反对APO的是狂热的右翼媒体和无端的暴力，1967年6月2日，本诺·欧内佐格（Benno Ohnesorg）被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年轻的学生在参加他在西柏林的第一次示威时被警察枪杀。2在这种情况下，APO被迫发展出了一种街头激进主义的能力，因为对运动的持续攻击与德国最近的历史阴影结合在一起，给它注入了一种“要么干，要么死”的紧迫感——这种态度不幸得到了证实，因为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SDS）的领导人鲁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是大众传媒施普林格出版集团（Springer）所发起的仇恨运动的目标，在1968年被一个准刺客开枪射中了三次，勉强活下来。（事实上，他将在11年后因受伤而死亡）。

在激进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联邦共和国只是披着新皮的第三帝国，而这种观点由于其针对新左派的暴力而变得更加可信，并对镇压、暴力和抵抗在活动家战略中的地位产生了影响。正如伊姆加德·莫勒（Irmgard Möller）在30多年后回忆的那样：

镇压没有使人们团结起来，但它使受影响的人的视角更加敏锐了。一个人所面对的是谁？一个人如何保护自己？最重要的是，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同行动的情况下，人们才能保护自己！然后，对整个司法系统、镇压系统的总览——他们会追求什么？他们会让我们经历怎样的磨难？我并不是说，迫害会自动产生一些好的东西。但在当时，重要的是，任何曾经上过街头的人——反对紧急状态立法，抗议越南战争，抗议希腊军政府，有无穷无尽的示威和游行——都感受到了威胁。国家认定这些都是犯罪。3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并受到第三世界解放斗争的启发，激进分子开始尝试一种新的政治干预形式：城市游击队。4

最初，这种武装发展表现为两种广泛的倾向。一个以公社和反主流文化为基础的团体，通常被描述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一些燃烧瓶袭击、抢劫和袭击警察事件。他们以慕尼黑和西柏林的诸如图帕马罗人、愤怒的黑豹的黑豹阿姨、散兵游勇中央委员会、西柏林嬉皮士和蓝调（the blues）等组织的名义活动，到1972年，所有这些团体的成员都凝聚成了6月2日运动（2JM），组织的名字来自于1967年欧内佐格被谋杀的日期。第一种倾向的特点是更加民粹主义的做法，并特别关注FRG内部的阶级问题。



1967年Benno Ohnesorg被谋杀后的示威（上）和1968年Rudi Dutschke被谋杀未遂后的示威（下）

出现的第二种游击倾向更明显是学生运动的产物，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信誉，不是因为内部的阶级压迫，而是因为它过去和现在在世界各地参与军事侵略和种族灭绝。5第二种趋势与第一种趋势有很大的重叠，有几人在其中来回穿梭，但它最终会沿着一条独立的道路发展。

走这条路的人构成了我们研究的对象，他们建立的游击队组织就是红军派。

**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战略**

红军派第一次宣示自身是在1970年，当时一个小组把一个年轻人从监狱里救出来。

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因放火烧毁两家百货公司以抗议越南战争而被判处三年徒刑。他的一个营救者古德伦·恩斯林也参与了这次政治纵火事件，她当时正在地下活动。另一位营救者乌尔丽克·迈因霍夫是一位著名的左翼社会评论家，他是一位记者，正在为一部关于劳教学校中女生的纪录片做最后的润色。她比其他游击队员年龄大得多，在联邦德国，她实际上是她那一代人中最有名的左翼女性知识分子；由于她在解救巴德尔中的作用，她别无选择，只能转入地下活动。

RAF因这次越狱而成为国际头条新闻，其间一位年长的图书管理员被枪击，受了重伤，这次行动在左翼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一年后，在西柏林一年一度的五一游行中，支持者们分发了该组织的基础宣言《城市游击队概念》，这份文件不仅提出了在大都市进行武装斗争的理由，而且还确立了RAF作为一个认真对待政治理论的团体的声誉。



在这份文件和随后的文件中，RAF将对资本主义和“在野兽腹中”进行抵抗的可能性进行独特的分析，以解决一个困难的事实（正如RAF前成员Knut Folkerts提出的），即“在[德国]的所有革命倡议——如果他们不想机会主义地解决这个问题——都会受到这个民族所呈现之现实与在这找到一个根据地之需要之间的矛盾。”6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RAF将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欧洲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见解与当时的反帝国主义相结合，认为第一世界的工人阶级遭受了一种独特的心理/文化压迫，即“二十四小时工作制”，充斥着“消费者的恐惧”。尽管有这种压迫，根据他们主观论的反帝国主义，大都市的物质问题不再是主要矛盾；战场已经转移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现在构成了全球的先锋队。虽然它不能免于矛盾和阶级压迫，但由于各种原因（社会民主主义、消费主义和收编进国家，等等），帝国主义的“安全腹地”——大都市，已经成为一个只能通过个人突破来动员人们进行革命的地方，例如，意识到资本主义下的生活是异化的，商品无法取代社区，或者靠别人的血来生活是不可接受的。7

虽然在《城市游击队概念》中可以找到这种分析的各个方面，但在1972年5月发行的《为人民服务：阶级斗争与游击队》中可以看到与前者相反的对西德贫困问题的关注点。8这些思想在1972年11月发布的《慕尼黑“黑色九月”行动：关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中得到了最终的综合。9

在这份文件中，联邦共和国政府内部的实质性分歧（material divisions）得到了承认，但被描述为次要的意识问题，即每个人与主流社会进行个人的和明确的决裂的能力。虽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据了解，这一战略的一部分是认为正确使用暴力可以迅速启动这样一种进程。因此，游击队袭击被概念化为一种打击敌人士气和激励人们与体制决裂的方式。虽然目标不是要挑起镇压，但人们期望国家的攻击可以转化为游击队的优势，暴露出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核心，导致更大的不满。因此，人们希望游击队即使不是燎原之火，也能起到火花塞的作用。多年后，克里斯蒂安·克拉尔（Christian Klar）解释说：

......我认为，RAF在正确的时刻积极行动并提供了灵感。我的意思是，不是从底层（base）出发，而是在现有矛盾的基础上采取行动，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制造裂痕，这种意识形态将资产阶级作为共同政治利益的代表——围绕这一点制造裂痕。在这方面，城市游击队的策略是有效的。另一件事，就群众基础而言，当然就是对发生在其他大陆的反殖民斗争的声援——以及对它们的认同。10

或者，更直白地说，正如赫尔穆特·波尔（Helmut Pohl）后来回忆的那样：

我不得不说，我们对在群众中进行鼓动没有信心。我们没有认真对待这种K团体11采用的革命战略。我们的计划不同于传统的共产党。我们开始了发展游击队和用行动分化/极化社会的过程。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游击队是小型马达，可以启动大型发动机。必须要建立和巩固这个小型发动机。12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被击退时，它的鸡被赶回家时，人们预测社会分化将在大都市内重新出现，而这些将再次为革命行动提供基础。那时，在这种激进的主体性基础上所做的工作才会真正结出果实。正如在《城市游击队概念》中所解释的那样：

[城市游击队斗争]是基于这样的分析：当武装斗争的条件成熟时，再去准备就会为时已晚。它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一个像联邦共和国这样具有很大暴力潜力的国家，如果没有革命的举措，那么当革命斗争的条件更加有利的时候，就不会有革命的方向，因为鉴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革命的条件很快就会出现。13

**七年反对国家的斗争**

1970年巴德尔被解救后不久，RAF成员前往中东的约旦，在那里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属的法塔赫的武器训练。RAF在其存在期间将广泛利用各个阿拉伯国家作为后方基地，在那里不仅可以进行训练，还可以在欧洲变得太“热 ”的时候躲藏起来。

回到联邦德国后，游击队再次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进行了一系列银行抢劫，并为今后的活动做准备。

成功地躲避了警察的追捕，RAF开始带上了民间英雄的光环，许多学生和左派很高兴看到有人将事情推向新的高度。数以千计的人在他们的钱包里秘密携带RAF成员的照片。一次又一次，当警察加强搜查时，这个年轻的游击队团体会发现门向他们敞开，因为他们被欢迎到人们的家里，包括不少中产阶级同情者的家里。当时的报纸以“知名人士保护巴德尔团伙”和“同情者阻碍了对巴德尔团伙的追捕”为标题进行报道。

在1971年7月的一次交火中，RAF成员佩特拉·谢尔姆被警察打死，此后不久，一项民意调查发现，40%的年轻人准备将RAF的动机描述为政治动机，而不是犯罪动机；20%的人表示，他们可以理解保护逃犯免于抓捕的努力；6%的人表示，他们自己愿意帮助隐瞒逃犯的身份。14

什么是后方根据地？

正如其他地方所讨论的那样：

后方根据地很少被讨论，但对游击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很准确：与主战区接壤的大片区域或领土，而另一方无法于其中自由行动。要么是由于地处偏远或难以穿越的山脉的原因，要么是由于它跨越了政治边界。1

对于RAF和其他西德游击队来说，在这方面，有两个国家尤其成为受青睐的旅行目的地：黎巴嫩和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前者是大量巴勒斯坦难民的家园，并且是几个革命组织的行动基地。后者是中东地区唯一自称是马列主义的国家，它的社会和经济改革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钦佩。2

在这两个国家，为欧洲游击队提供庇护的不是政府，而是一个巴勒斯坦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外行动），即PFLP（EO）。这是在1970年代初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分裂出来的一个小型武装组织，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开展袭击活动。3

在整个1970年代，人阵（EO）在中东的训练营地成为许多西欧游击队的避难所。事实上，参与77年攻势的大多数RAF成员都曾在这些营地呆过，在那里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使用各种武器，而且还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革命者会面。

1 Butch Lee, *Jailbreak Out of History: The Re-Biography of Harriet Tubman* (Montreal: Kersplebedeb Publishing, 2000), 25.

2 Joe Stork,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Arabia: A Report from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MERIP Reports* 15 (March 1973): 1-25; Maxine Molyneux, Aida Yafai, Aisha Mohsen, and Noor Ba’abad, “Women and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 Feminist Review 1 (1979): 4-20.

3 Moncourt and Smith, 559-561.

然后，在1972年，紧接着《为人民服务》在当年的“五一”示威活动中发行后，该组织将事态扩大，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为“五月攻势”的爆炸活动。目标包括警察局和美国军队总部，以抗议警察的谋杀和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以及对施普林格出版社汉堡办事处的袭击，该出版社被指控支持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煽动对新左派的暴力。四名美国士兵被杀，其他数十人受伤，包括平民。这些袭击不仅在西德是空前的——西欧本身在战后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15虽然许多人可能对这种升级感到厌恶，但其他人却认为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说明可以做些什么。

随后，在西德和美国情报部门的支持下，一支军警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检查站并进行了突击检查。

在几周内，十名RAF成员——几乎是整个游击队——被抓获。除了所谓的领导层（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霍尔格·迈因斯、扬-卡尔·拉斯佩与乌尔丽克·迈因霍夫），警察还逮捕了克劳斯·于恩施克（Klaus Jünschke）、伊姆加德·莫勒、格哈特·穆勒、布丽吉特·莫恩豪普特与贝恩哈特·布劳恩（Bernhard Braun）。16一名支持者卡塔琳娜·哈默施密特。这11人加入到了在过去两年中已被逮捕的其他几名来自RAF和2JM的战斗人员中。



抓捕霍尔格·迈因斯

国家在逮捕了其武装对手后，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将他们从战场上清除。相反，它不仅希望使他们不能作为战斗人员，而且不能作为反帝国主义抵抗的代言人而存在。为此，它在监狱里设立了特殊的“死囚区”，被俘的游击队员在那里受到严格的隔离，显然是希望哪怕这不能促使他们悔过，至少可以使他们发疯。

隔离——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采取剥夺感觉的形式——是由在西欧和北美工作的特务机构、刑事当局、医生和心理学家组成的邪恶联盟开发的，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种“干净的酷刑”，即一种可以击垮囚犯而不留下身体痕迹的酷刑。RAF和西德的其他游击队将成为这一计划的首批试验对象。

阿斯特丽德·普罗尔是一名RAF成员，1971年因向一名警察开枪的虚假指控而被逮捕，她是第一批被隔离关押的人之一。她在科隆的奥森多夫监狱17中的一个空荡荡的区域被关押了四个半月，她的牢房被涂成白色，并进行了隔音处理，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感官刺激，也没有与其他囚犯的接触。她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恶化到几乎无法行走的地步，国家不得不将她释放到黑森的一家疗养院，她在那里呆了一年，然后逃到了英国。即使多年后被重新抓获，普罗尔仍然对她的遭遇感到痛苦。1978年，她写道：

甚至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有完全从那之中恢复过来。我无法忍受刷成白色的房间，因为它们让我想起了我的牢房。树林里的寂静会让我感到害怕，它让我想起了孤立牢房里的寂静。黑暗让我感到很压抑，好像我的生命被夺走了。孤独给我带来的恐惧与被人群包围一样多。即使在今天，我偶尔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动弹不得。18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在1972年被捕后在这种条件下被关押了237天。在经历了八个月的这种折磨后，她写道：

我终于意识到，我必须把自己从这里面拉出来，我自己没有权利让这些可怕的事情继续影响我——我有责任为自己争取出路。在监狱里，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在墙上涂鸦，与警察发生冲突，破坏设备，绝食。我想让他们至少把我抓起来，因为那样你就能听到一些声音——你没有收音机在耳边弄出声音，只有圣经可以读，也许没有床垫，没有窗户，等等——但这是与听不到任何声音不同的折磨。显然，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解脱。19

反对隔离和各种“死囚区”很快就成为RAF支持者最重要的问题，并将在整个1970年代一直如此。这样一来，尽管被囚和被隔离，游击队不仅设法生存下来，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扭转了局面，因为通过战略性地使用绝食，他们将呼吁人们关注他们的监禁条件和他们反帝国主义武装斗争的策略。事实上，绝食成为了囚犯们维护其尊严和政治身份的一种方式。20

从1974年RAF的第三次绝食开始，一个关键的要求是与政治犯的“联系”（”association”）。正如我们在第一卷中解释的那样：

囚犯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新左派对社会囚犯等边缘化群体的高度尊重具有不可否认的吸引力，但融入[普通人群]的要求根本行不通。因此，融入被放弃了，现在的斗争被定义为反对隔离和支持政治犯相互联系的斗争......

在实际中，联系意味着将政治犯聚集在一起，使其有足够大的社会生存能力，15人是通常的最低人数。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犯，如意大利和北爱尔兰，已经为自己赢得了这样的条件，因此人们希望这会是一个现实的目标。21

在绝食六周后，1974年11月9日，RAF成员霍尔格·迈因斯去世，在整个西德引发了抗议活动。数千人在西柏林的大学礼堂开会，讨论如何应对，还有数千人不顾示威禁令，走上街头，用石头和瓶子与警察搏斗，法兰克福和曼海姆的抗议者砸碎了法院大楼的窗户。22

第二天，在一次失败的绑架行动中，六二运动（2JM）枪杀了西柏林最高法院院长Günter von Drenkmann法官，目的是为迈因斯复仇，甚至有可能为一些囚犯赢得自由。

RAF的囚犯支持团体已经成立，一个保护欧洲政治犯的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es Komitee zur Verteidigung politischer Gefangener in Europa, IVK）与各种反酷刑委员会以及联邦德国的亲属委员会一起工作，但现在，囚犯的斗争将为他们赢得的不仅仅是同情：它将赢得新成员。因为，在许多德国左派眼中，RAF已经象征着对帝国主义国家、对“新法西斯”或“法西斯漂移”的抵抗。

在迈因斯死后，囚犯们将继续他们的第三次绝食，直到一个重生的RAF发布了一份针对他们的公报，在其中命令囚犯们重新开始进食。游击队承诺，他们将代表他们采取必要的行动，并解释说监狱斗争“现在是我们必须用武器解决的事情”。23

这一点很快就会实现：4月25日，RAF的“霍尔格·迈因斯突击队”占领了西德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顶楼，劫持了十二名人质，并杀了军事和经济专员。他们要求释放26名西德政治犯，包括所有被俘的RAF囚犯。



KPD/ML虽然敌视RAF，但却是唯一支持1974-1975年绝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涂鸦上写着：“霍尔格·迈因斯，人民会为你复仇”。

在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领导下，西德政府拒绝向突击队的要求让步，当警察准备冲进大楼时，游击队埋下的炸药被引爆。国家和媒体会声称，炸药爆炸是由于突击队的一些错误；游击队则认为是警察故意引发了爆炸。一名RAF员乌尔里希·韦塞尔当场死亡。警察冲了进来，RAF成员西格弗里德·豪斯纳、Hanna Krabbe、卡尔-海因茨·德尔沃、Lutz Taufer和Bernd Rössner都被逮捕。

尽管豪斯纳头骨骨折，身体大部分被烧伤，但他只住院了几天。然后，不顾瑞典和德国医生的反对，他被空运到联邦德国的施塔姆海姆监狱，不久后在那死亡。24

国家面临的事实是，RAF的“第一代”25从监狱中成功地激励了自己的继任者。施密特总理甚至说，“无政府主义游击队”现在构成了联邦共和国在其26年历史中遇到的最大威胁。摧毁囚犯，或至少削弱他们的支持，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恐惧的宣传被加强了：有人声称RAF拥有核武器，并打算绑架儿童来换取囚犯。不再有什么故事会被当成是荒唐的，因为那几个在监禁中被打垮的成员被作为国家证人游街示众，不停指控各种恐怖的事。证据，甚至是稍微有说服力的证据，都不再被认为是必要的。

这些肮脏的伎俩被国家用于镇压的基础机构的快速发展填补。1971年9月，联邦刑事局（BKA）任命了一位新的首席专员：霍斯特·黑罗尔德（Horst Herold）是纽伦堡警察局的前局长，也是将计算机化数据处理作为执法工具的新方向的专家。在其领导下，BKA从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机构转变为相当于西德联邦调查局的机构。到20世纪70年代末，其预算增长了6倍，工作人员增加了3倍，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警察部队之一。26

1975年，黑罗尔德撰写了一份题为“打击恐怖主义中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原则”。他认为，“虚假信息是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必须进一步发展，并应与其他打击类战争活动的手段并驾齐驱”，他建议向“报刊、广播和电视”提供虚假信息，并在激进左翼内部传播。其目的是“在反对派团体中制造异议从而摧毁他们”，“使恐怖分子显得不那么英雄”被列为一种手段。27

到1979年，黑罗尔德的电脑里有470万个人和3000多个组织的档案，以及190万人的照片和210万套指纹。28虽然从那以后，只要警察一按键盘就能获得这些数据成了惯例，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代表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监控水平。

在同一时期，对囚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牢房经常被搜查，与对他们审判有关的文件被没收。甚至他们的律师也受到攻击，被指控支持游击队，在某些情况下被禁止进行辩护。当“巴德尔·迈因霍夫法”（Lex Baader-Meinhof），在1975年成为宪法修正案时，所有这些都有了合法形式。特别是，第138a-d条允许排除任何被认为是“与被告形成犯罪联系”的律师，而第231a和231b条允许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判，如果缺席的原因被认定是被告自己造成的——这条规定直接针对囚犯有效使用绝食斗争。29第146条禁止提出联合辩护，即使许多囚犯面临连带审判。第148条和第148a条规定了对辩护方信件的监视，而根据第275a条规定，被告和辩护律师以前拥有的发表声明的权利被撤销了。30到1976年，这些条款得到了第129a条和第88a条的补充，前者是第129条的反恐怖主义分支，用于应对犯罪组织，后者则将所有“制作、分发、公开展示和宣传引诱非法行为的材料——如在特殊（如武装）案件中扰乱公共秩序、谋杀、过失杀人、抢劫、敲诈、纵火和使用爆炸物”的人定罪。31

随着一个特殊的“防恐怖分子”地堡的建造，这种压抑的气氛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因为国家宣布在普通的斯图加特法院进行对“RAF头目”的审判是不可能的。这个紧邻施塔姆海姆监狱的地牢式法庭配备了防空设施，以抵御直升机攻击，在建筑物周围的地面上埋设了监听装置，还有几十台闭路摄像头，以及一条通往监狱的地下通道，这样被告就可以在不公开露面的情况下被带入法庭和离开。32

在所谓施塔姆海姆审判中，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霍尔格·迈因斯、扬-卡尔·拉斯佩与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将面临与五月攻势有关的指控，这场审判直到1975年才开始，那是在被告被捕三年后，迈因斯因绝食而死仅仅一年之后。（如果他没有死，他也会在那里受审。）由于对律师同情者的攻击，并非所有的被告都有自己选择的法律代表，而且后来发现，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位法官向一家保守派报纸泄露了法庭文件。尽管国家声称它没有关押政治犯，但从来没有人假装这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也没有人努力去假装这是一个公平的审判。

1976年5月9日，就在诉讼程序进入最关键的阶段时，这种已经很糟糕的情况急剧恶化。在那一天，国家宣布乌尔丽克·迈因霍夫已经死在她的牢房里，显然是上吊自杀。BKA散发了几个月前在搜查牢房时发现的笔记摘录，以造成迈因霍夫与巴德尔、恩斯林一方发生争执的印象。囚犯和大多数左派立即谴责自杀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并毫不犹豫地指责国家谋杀了这位被许多人视为RAF首席理论家的女人。

用迈因霍夫自己的话，她被发现死亡前一天中的庭审记录的一部分来说就是：“当然，在反叛乱冲突中，在游击战中，干掉领导人是警察的一种战术。”33

她的姐姐Wienke Zitzlaff也同样拒绝接受国家对事件的描述。“我妹妹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她永远不会自杀，”她回忆说，“她说，如果有报道说她自杀了，那么我就知道她是被谋杀的。”34

迈因霍夫之死对联邦德国和整个西欧左派产生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一封由各种知识分子——包括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签名的公开信将其与纳粹时代最严重的罪行相提并论。柏林泰格尔监狱的社会犯和政治犯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绝食抗议，在巴黎，两家西德钢铁公司的办公室被炸，图卢兹的德国文化中心、罗马的德国学院与西德旅游局也被炸。作为法国和意大利本土武装运动的产物，这些袭击事件见证了整个西欧的各种战斗人员之间存在的团结，也见证了RAF，特别是迈因霍夫，在那些与他们一起拿起枪的其他人的精神世界中的突出地位。

与此同时，在联邦德国，炸弹在慕尼黑的美国武装部队广播站外和半夜在一个购物中心爆炸，全国各地有数千人参加了示威活动。

法兰克福的打斗尤为激烈；据一位警方发言人称，“这是该市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35在一次集会后，数百人在市中心横冲直撞，砸碎了美国运通公司和美国之家文化中心的窗户，并设置路障，用燃烧瓶抵御警察的水炮。有12人被捕，7名警察受伤，其中两人的汽车被烧毁，伤势严重。（随后发生的镇压，以及法兰克福圈子无力应对这种近乎致命的暴力后果，将预示着该城市的反权威左派开始走向衰落，并带来深远的影响。）36



迈因霍夫死后，警方在法兰克福示威活动中殴打抗议者

5月15日，大约七千人在西柏林参加了迈因霍夫的葬礼，其中许多人弄黑了脸，蒙着头，以免被警察认出。她的姐姐要求将捐款捐给囚犯支持运动，以代替鲜花。当他们离开墓地时，哀悼者与西柏林市中心、莫阿比特法院外的示威者走在一起——两年前，迈因霍夫曾在一次审判中于莫阿比特法院被判刑。同一天，在联邦德国和国外发生了更多的炸弹袭击。

三天后，西柏林又发生了一次八千人的示威游行，其间有几名警察受伤。炸弹继续在法国爆炸，挂着德国车牌的汽车和一家右翼报纸的办公室成为目标。6月2日，法兰克福的美国陆军总部和美国军官俱乐部被炸。这最后一次袭击是由革命细胞“乌尔里克·迈因霍夫突击队”进行的。（RZ是西德第三大游击队倾向；见第二章。）

最后，一个调查乌尔丽克·迈因霍夫之死的国际调查委员会（Internationale Untersuchungskommission zum Tod von Ulrike Meinhof）成立了：它花了三年时间才公布调查结果，但在1978年，它宣布发现了迈因霍夫被谋杀的证据——国家断然拒绝了这一说法，认为这是RAF支持者的捏造，旨在操纵人们去轻信。然而，围绕着迈因霍夫之死的许多不一致和令人不安的细节，从来没有被那些否认谋杀论的人充分解决或解释。37

当然，在当时，许多激进左翼认为，迈因霍夫已经被杀害，这只是增加了已然压倒性的紧迫感。

囚犯的斗争在RAF的整个存在期间一直非常重要，但从未像1977年那样重要。

这一年的3月29日，RAF的囚犯开始了他们的第四次绝食斗争，要求获得《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待遇，以不少于15人的小组为单位联系，结束隔离，并对RAF在押囚犯的死亡进行国际调查。38起初有35人参加，但很快拒绝食物的囚犯人数就超过了100人，有些甚至拒绝液体。

游击队不打算让囚犯们自己发动这场战斗。4月7日，当司法部长西格弗里德·布巴克在一个红绿灯前等待时，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停在他的奔驰车旁边。突然，其中一个人掏出一把冲锋枪并开火，用子弹打中了汽车。

作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BAW）的领导人，布巴克对已经夺去迈因霍夫、豪斯纳和迈因斯生命的监狱条件负有直接责任；在评论国家用来镇压游击队的肮脏伎俩时，他被引述说：“国家安全是由那些致力于它的人赋予生命的。像黑罗尔德和我这样的人，我们总能找到办法。”正是以“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突击队”的名义，RAF发表了一份公报，声称对他的暗杀负责，并说：“对于像布巴克这样的‘体制的首脑’，历史总是能找到办法。”39



Attorney General Siegfried Buback, April 7, 1977



通缉令寻求有关杀害司法部长Siegfried Buback的最初嫌疑人Günter Sonnenberg、Christian Klar和Knut Folkerts的信息。

一天之内，警方宣布正在寻找与这次袭击有关的三名嫌疑人。尽管一名目击者称枪手身材娇小且为女性，但BKA调查人员将焦点集中在三名男子身上：君特·佐嫩伯格（Günter Sonnenberg）、克努特·福克茨（Knut Folkerts）和克里斯蒂安·克拉尔（Christian Klar），他们都在迈因霍夫死后的几个月里从囚犯支持圈子转入了RAF中。40对他们不利的主要证据似乎是，在转入地下活动之前，他们都曾住在卡尔斯鲁厄，即袭击发生的城市。警察悬赏了200,000马克（88,000美元）来抓捕他们。

绝食斗争继续进行，巩固了支持。不久，囚犯的亲属开始了声援绝食斗争。4月17日，法兰克福的彼得教堂被占领，变成了一个绝食信息中心。当拒绝食物的囚犯人数达到120人时，更多的外部支持者开始在比勒费尔德的一座教堂进行第二次声援绝食。4月27日，政治犯的亲属在日内瓦的联合国总部举行示威，要求适用《日内瓦公约》。第二天，大赦国际与八十名牧师、一百二十八名美国律师、一百名法国和比利时律师以及二十三名英国律师一道，呼吁国家解决囚犯的要求。

滚雪球式的支持是有效的：4月30日，一位政府发言人宣布，囚犯将被授予有限的权利以互相接触联系。施塔姆海姆监狱的第七层很快就被翻修，允许多达16名囚犯住在一起。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古德伦·恩斯林、扬-卡尔·拉斯佩与伊姆加德·莫勒（迈因霍夫死后她被转移到施塔姆海姆）很快就会与RAF囚犯英格丽德·舒伯特（Ingrid Schubert）、沃尔夫冈·贝尔（Wolfgang Beer）和维尔纳·霍佩（Werner Hoppe）一起。41

作为对这次胜利的回应，囚犯们同意结束他们的绝食抗议。

然后，5月3日，RAF成员君特·佐嫩伯格和维蕾娜·贝克尔（Verena Becker）在靠近瑞士边境的德国辛根镇被俘。一名妇女在发现两人坐在一家咖啡馆后向警方提供了线索：她从布巴克被刺杀后在整个西欧张贴的通缉海报中认出了佐嫩伯格。当警察赶到现场时，游击队试图装作镇定，无辜地假装把身份证件留在了车上。当他们被护送出咖啡馆时——可能是为了取回这些虚假的身份证件——他们拔出武器，向两名警察开枪，抢了一辆车，然后离开。在被发现的警车追赶下，他们转错了弯，最终进入了一片田野，这时他们扔下车步行逃跑。

当他们逃跑时，贝克尔扔下了她的冲锋枪——事实证明，这正是用来杀死布巴克的武器。一名警察捡起武器并开枪： 贝克尔的腿被击中，佐嫩伯格的躯干和头部被击中。他的伤势严重，尽管他的脸出现在全欧洲的通缉令上，但警方难以确认他的身份，他将在昏迷中度过四个星期。虽然他确实活了下来，但他的大脑受到了损伤，最初不记得自己的过去，甚至不知道如何说话，至今仍容易出现癫痫发作。

当他还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被注射了镇静剂，无法掌握周围的情况，也无法连贯地说话时，Horst Kuhn法官对他进行了审讯，记下了他的每一个咕噜声。作为在审判中对他不利的证据。从1979年开始，释放佐嫩伯格将成为每一次RAF囚犯绝食抗议和游击队本身的一贯要求。尽管如此，他仍被关押到1992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隔离中度过的。



Günter Sonnenberg

第二次袭击发生在7月30日，当时包括苏珊娜·阿尔布雷希特（Susanne Albrecht）在内的三名RAF成员带着鲜花来到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主席、西德最重要的金融家之一约尔根·庞托（Jürgen Ponto）的门口。庞托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有直接联系，并曾担任南非残暴的种族隔离政权的顾问。他还是阿尔布雷希特妹妹的教父，也是她父母的亲密朋友。游击队试图绑架他，但当他反抗时，他们开火，向他开了五枪。由于阿尔布雷希特已被庞托的妻子认出，她在这次行动的公报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8月8日，一个月前刚被转移到施塔姆海姆的RAF囚犯被转移回汉堡。所用的确切借口是与看守“打架”：本质上是一个圈套，即看守挑起一个事件，并以此为借口攻击和殴打囚犯。布巴克的继任者库尔特·雷布曼（Kurt Rebmann）似乎正在推翻他之前允许囚犯间接触联系的决定。

巴德尔、拉斯佩、恩斯林和莫勒再次被各自单独关押在施塔姆海姆监狱的第七层。

作为对这些阴谋和袭击庞托的反应，所有RAF囚犯都开始绝食，有些人几乎立即升级到绝食。几天后，强制喂食开始了：这是一种虐待性的刑罚手段，囚犯们被下药，被绑在桌子上，每次都有一根管子被塞进他们的喉咙，持续数小时。这并不是为了拯救绝食者的生命，而是国家在与囚犯的斗争中所依赖的另一种酷刑形式。例如，在1974年绝食斗争中死亡的霍尔格·迈因斯就曾被强行喂食了数周。正如他在死前不久所写的那样：

使用一根红色的硬胃管（不是软管），大约有中指那么粗（对我来说是大概两指节间那么厚）。它被涂了油，但吞咽下去却让我呕吐，因为它只比消化道窄1到3毫米（只有在做吞咽动作并保持完全静止时才能避免）。当管子伸入时，哪怕最轻微的刺激都会引起作呕和反胃、胸部和胃部肌肉痉挛，引发全身极度剧烈抽搐的连锁反应，让人极其强烈的抗拒胃管。这种情况越极端，持续时间越长，情况就越糟糕。43

用1974年被俘的RAF成员Margrit Schiller的话来说：“我在一个月内每天都被强行灌食。每一次都像一次强奸。每一次，我都感到彻底的羞辱和毁灭。”44

辩护律师Armin Newerla和Arndt Müller开始组织公众对囚犯抗议的支持，并因此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8月15日，律师们的办公室被炸毁，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警察的勾结下，他们一天24小时都被盯着。Newerla随后被逮捕，因为在他的车里发现了一份左翼杂志的副本；根据第129a条，他被指控“支持犯罪组织”。看到墙上的字后，辩护律师克劳斯·克罗桑逃到了法国，在那里他请求政治避难。（由于他为RAF的被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克罗桑已经被骚扰了好几年。）

新任司法部长确定了他将被铭记的强硬立场。“我知道，如果这些人进行绝食和绝水抗议，民众一点也不感兴趣，”雷布曼告诉媒体，“民众希望这些人受到严厉的打击，就像他们用残暴的行为为自己赢得的那样严厉。”

他被问及囚犯死亡的可能性。“这总是一件坏事，”他回答说，“但这将是已经向他们及其律师说明的后果，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监禁的条件并不能证明这样的抗议是合理的；考虑到这种情况，他们做得非常好。”45

8月25日，RAF以雷布曼的办公室为目标进行了回应。一个简易的火箭发射器瞄准了司法部长的总部，但定时装置没有设置好，所以没有发射。

RAF试图以最好的方式来解释这次事故，一周后发表了一份公报，声称整个演习只是为了作秀。游击队继续警告说，如果证明有必要拯救囚犯，他们非常愿意采取行动：

如果安德烈亚斯、古德伦和扬被杀，那些为强硬路线辩护的人将发现，他们并不是唯一拥有武器的人。他们会发现，我们人多势众，我们有足够的热爱——以及足够的仇恨和想象力，可以同时使用我们的武器和他们的武器来对付他们，他们的痛苦将与我们的痛苦相同。46

在迈因霍夫死后，鉴于雷布曼的嗜血言论，游击队显然担心国家可能会采取行动，杀死巴德尔、恩斯林和拉斯佩。囚犯们自己也有这种担心，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因为RAF的行动而遭受报复。

因此，在大赦国际和联邦政府之间的谈判破裂后，囚犯们于9月2日取消了他们的绝食和口渴抗议。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拉斯佩解释说，对庞托、雷布曼办公室的袭击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囚犯成为一个国家的人质，这个国家准备并愿意杀死他们来树立一个榜样。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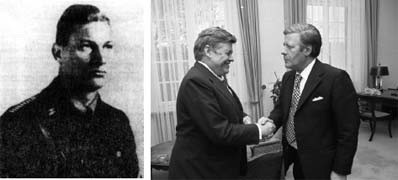
**德国之秋**

庞托绑架失败的目的是作为两步走行动的第一步，对西德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迫使国家释放囚犯。48尽管他们没能活捉庞托，但还是决定贯彻这一计划的第二部分。

9月5日，RAF的西格弗里德·豪斯纳突击队“绑架了汉斯·马丁·施莱尔”，他是当时西德最有权力的商人。施莱尔的汽车和警察护卫队被放在路中间的婴儿车逼停，这时他们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游击队杀死了他的司机和三名警察，然后逃走了。

不久后收到的一份说明警告说：“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停止追捕的所有方面——否则我们将立即枪毙施莱尔，甚至不会为他的自由进行谈判。”49

与庞托一样，施莱尔是统治阶级的有力代表。他是德国工业家联合会（Bunde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和德国雇主联合会（Bundesverein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geberverbände）的主席，并且在1966年他命令对巴登-符腾堡州罢工的金属工人实行锁场（lock out）时，因积极反对工人的要求而赢得声誉。作为希特勒党卫军的一名老兵，他是前纳粹分子融入战后权力结构的完美象征。



1974年，身着制服的年轻人汉斯·马丁·施莱耶（左），后来成为工业巨头，1974年会见了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

在施莱尔被绑架后的一天内，突击队要求释放11名囚犯，包括恩斯林、拉斯佩和巴德尔，并要求他们安全地前往他们选择的国家。

尽管这些囚犯提出保证，如果被流放，他们不会返回西德或参加未来的武装行动，但9月6日，政府宣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释放他们。

同一天，对所有政治犯实行了全面的通讯禁令。所谓的“禁止接触法”是专门为处理这种情况而匆匆通过议会的，它剥夺了囚犯之间以及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所有的探视，包括与律师和家人的探视，都被禁止。囚犯们还被剥夺了接触邮件、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的权利。

简而言之，受此法律约束的人被置于100%的个人隔离状态。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当游击队试图通过一系列越来越绝望的公报与国家进行谈判时，国家对施莱尔和其绑架者的追捕仍在继续。在此期间，他被转移到西德、荷兰和比利时的一系列安全屋之间。

9月22日，RAF成员克努特·福克茨在乌得勒支被捕，这次枪战导致一名荷兰警察死亡，另有两人受伤。另一名RAF成员设法逃脱。寻找施莱尔的工作扩展到了荷兰，但毫无成果，国家继续拖延时间，游击队让一个又一个最后通牒过去了。

在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一支巴勒斯坦突击队为声援RAF而进行了干预，将本已激烈的对抗推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10月13日，由人阵（对外行动）50的佐海伊尔·尤素福·阿卡什（Zohair Youssef Akache）领导的四人组成的“哈利梅烈士（Martyr Halimeh）突击队”劫持了一架从西班牙马略卡岛飞往西德法兰克福的汉莎航空客机，机上90人被劫为人质。

该客机首先被转移到罗马加油，并提出突击队的要求：释放11名RAF囚犯以及两名被关押在土耳其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

飞机随后飞往塞浦路斯，并从那里飞往海湾，先在巴林降落，然后在迪拜降落。联邦德国负责特别事务的部长汉斯-于尔根·维申涅夫斯基（Hans-Jürgen Wischnewski）承诺不会进行军事干预。飞机第二天出发，计划飞往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南也门），那里是人阵（EO）的训练营地，其政府有容忍来自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地方游击队员的历史。

然而，在这里，劫持者的计划出了岔子。南也门政府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提供避难所，而是试图阻止客机降落，甚至派驻坦克阻止客机进入跑道。当这一措施未能奏效时（飞机紧急降落），劫持者被允许加油，但随后被迫离开。这代表了一个关键的挫折；他们带着担忧，现在制定了一个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路线。

被劫持的客机于10月17日在摩加迪沙降落。 随着谈判的继续，西德的“反恐”GSG-9部队被秘密空运到索马里首都。当晚，60名GSG-9突击队员袭击了客机，杀死了游击队战士佐海伊尔·尤素福·阿卡什、信德·阿拉玛（Hind Alameh）、纳比鲁·哈勒本（Nabil Harb），并重伤了苏海伊拉图·安迪鲁兹（Souhaila Andrawes）。所有人质都安然获救，尽管机长Jürgen Schumann在前一天晚上被处决，其尸体被留在南也门。51

第二天（10月18日）早上7点，一位政府发言人公开宣布解决了劫持事件。

一小时后，另一位发言人宣布古德伦·恩斯林和安德烈亚斯·巴德尔“自杀”，扬-卡尔·拉斯佩和伊姆加德·莫勒在施塔姆海姆监狱“自杀未遂”。拉斯佩后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国家提出了大量离奇的“巧合”和不正常现象来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据称在西欧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四个人不仅获得了枪支（巴德尔和拉斯佩头部中弹），而且还设法协调了一次集体自杀，作为对发生在不同大陆的军事突袭的回应，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严格禁止囚犯与彼此和外界沟通的条件下（没有广播、电视、报纸等）。

在迈因霍夫死后的一年里，施塔姆海姆监狱的囚犯们多次表示他们害怕类似的“被自杀”。他们在死前几天与监狱牧师的谈话和给律师的信中都强调了这一点。特别是恩斯林曾告诉两位牧师，她的牢房里有一些信件，其中包含重要信息，如果她被杀，应该转交给有关当局——不用说，政府最初否认发现了任何此类信件。直到后来，监狱管理局才承认这些信被没收了；直到今天，这些信还没有被公布。52



“Andreas Baader, Gudrun Ensslin, Jan-Carl Raspe murdered in Stammheim.”

国家的自杀故事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本应拍摄囚犯楼层上发生的一切的闭路摄像头在当晚神秘地故障了。不一致之处不断出现。53对许多人来说，最关键的是，其中一名囚犯没有死于她的伤势：伊姆加德·莫勒胸部被刺了几刀，但她一直坚决否认政府的自杀说法，而是坚持认为一定是政府的突击队杀死了她的同志，就像政府在那晚试图杀死她一样。摘自1992年《明镜》杂志的一次采访：

《明镜》：当局认为，你知道冲进飞机和释放人质的事，并因此试图用菜刀自杀。

伊姆加德·莫勒：这是个谎言。我在晚上11点多听了最后的新闻。54我知道会有事情发生，会有人做出决定。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决定。我发现那是无法忍受的。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明镜》：然后呢？

伊姆加德·莫勒：在夜里的某个时刻，我听到了一种沉闷的声音，我无法辨认，一种明显的声音。我没有想到这是枪声：听起来像是一个柜子倒下了，或者类似的声音。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是我躺在霓虹灯下的地板上，周围的人都在抓着我，试图迫使我睁开眼睛。然后我听到有声音说：“巴德尔和恩斯林死了。”然后一切都慢慢消失了。

《明镜》：在那之后你还记得什么？

伊姆加德·莫勒：三天后我第一次恢复了意识，清楚地记得之后发生的一切。

《明镜》：你受的伤性质是什么？

伊姆加德·莫勒：我的胸部有四处刺伤。我的肺部受伤，心包膜上充满了液体，心泡也被刺中了。

《明镜》：一些医学专家，包括一些来自国外的专家，得出的结论是，你同伴的死亡是自杀案件。

伊姆加德·莫勒：我知道。很明显，他们并不客观。他们是被故意放进来的。我知道验尸报告的细节，也知道，例如，古德伦的一处伤势没有得到认真检查。

《明镜》：你认为是谁造成了这些伤害？

伊姆加德·莫勒：我不认为是一直在那里的看守。我认为是一支突击队。当时有很多人进入了监狱区域。55

尽管如此，政府的自杀理论最终还是被许多左派人士所接受，甚至也被一些前RAF成员所接受。但在77年，认为囚犯是被谋杀的观点很普遍。就激进左派而言，这很清楚：就像迈因霍夫一样，其他施塔姆海姆的囚犯现在已经被国家杀害。

面对各方面的失败，RAF现在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它已经处决了施莱尔。

四十三天后，反帝国主义游击队与西德政府之间最激烈的冲突似乎已经结束，但还会有一个人死亡：11月11日，RAF囚犯英格丽德·舒伯特被发现在她的牢房里上吊，这是在她被转移到慕尼黑的施塔德海姆监狱的隔离区一个小时之后。在她死前的星期四，她曾向她的律师保证，她无意自杀。

**坏日子**

1977年，RAF对释放囚犯的关注达到了极限，但其为期七个月的暗杀和绑架活动却一无所获。随着第三世界突击队的绑架劫持，联邦德国被推入紧急状态，远远超出了西德运动的能力范围。施塔姆海姆的死亡事件给这个等式带来了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因素，其结果是大规模的心理创伤，在游击队及其支持者中尤其明显。

正如RAF成员莫妮卡·贝贝里希多年后解释的那样：

我认为这两个晚上，乌尔丽克的死和施塔姆海姆其他三名囚犯的死一样，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不仅是对武装组织，而且是整个激进左翼的失败，而且这与施塔姆海姆那几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无关。早上，对我们继续从事斗争而言极为重要的同志们都死了。1977年，随着对客机的突袭，国家取得了胜利。囚犯的死亡确实降低了国家胜利的程度，但与国家立场的胜利相比，这并不十分重要。我想在当时，我们没有足够自觉地处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都感觉到了。相反，我们无休止地争论这到底是谋杀还是自杀。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它不能改变同志们已经死亡的事实。56

国家以对整个左派的镇压浪潮来回应77年的攻势。在西柏林，38个公寓、书店和印刷厂被突袭，40人被拘留，引发了警察总部外的抗议，警察们挥舞着橡皮警棍迎接。57激进报纸《Info-BUG》成为目标，该报纸被禁止，其几名印刷工人被送进监狱。

为RAF囚犯和外部支持者辩护的律师发现自己被逮捕，并被指控支持恐怖组织。

但后果远远超出了逮捕的范围：随着所谓德国之秋的展开，整个政治文化似乎都向右倾斜。任何敢于公开支持公民自由的人，无论他们对武装策略的批评程度如何，都会立即成为嫌疑人，成为潜在的恐怖分子。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总统在施莱尔国葬上讲话时宣称：

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是文明对试图破坏所有秩序的野蛮的斗争...... 他们是每一个文明的敌人......地球上的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惊恐地意识到，受到攻击的不是这个或那个秩序，而是所有秩序。

他特别提到任何敢于在施塔姆海姆死亡事件后提出抗议的人，说：“他们也有罪责。”58正如《新德国批判》中描述的那样：

10月中旬，全国上下形成了一种虚拟的战争气氛：数十万驾车者被拉下马路进行搜查；当局不断向民众发出呼吁，鼓励他们向警察报告任何可疑的活动——例如突然改变地址、理发或任何其他外貌变化、不寻常的邮件或出版物。59

大多数人都支持政府，不仅是在追捕RAF的过程中，而且是在更广泛的镇压中。在一项民意调查中，6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接受通过控制和搜查房屋来限制个人自由，而只有21%的人反对。60

与此同时，政治家和媒体变得更加无情。在施塔姆海姆死亡事件之后，即使允许恩斯林、拉斯佩和巴德尔被埋在一个共同的坟墓里，也足以让人得到“对恐怖主义软弱”的恶名。斯图加特温和的基民盟（CDU）市长曼弗雷德·隆美尔——著名的陆军元帅的儿子——拒绝禁止这样的埋葬，坚持认为“死亡必须结束所有的敌意”。结果，他发现自己在CDU州党组织中被边缘化了，愤怒的市民纷纷打来电话，要求将RAF的死者火化，将他们的骨灰倒入城市下水道。

正如1977年RAF的失败给游击队和囚犯带来了灾难一样，它同样巩固了国家的权力。直到今天，反叛乱专家都把摩加迪沙作为干预的典范，没有人对总理施密特个人声望的上升感到惊讶。在他们回国后，突袭飞机的GSG-9突击队员被奉为英雄，该部队的负责人乌尔里希·韦格纳（Ulrich Wegener）获得了著名的十字勋章。作为对77年事件的回应，内部安全预算增加了1亿美元，在1978年达到6.5亿美元。

卡洛斯·马里盖拉（Carlos Marighella）的《城市游击队手册》（*Minimanual of the Urban Guerilla*）影响了许多从新左派中产生的武装团体，他曾表明，通过挑起不成比例的反应，游击队可能会疏远民众与国家的关系。然而，在1977年，这一策略被颠覆了，国家酷刑囚犯迫使游击队夸大自己的力量，从而使其在未来几年的斗争中名誉扫地。

RAF及其狱中囚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红军派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善意忽视”不再？

在整个1970年代，西德游击队得益于亲苏的东德集团的一种良性忽视。东德安全人员对通过东柏林往返于联邦德国和中东的游击队视而不见，而贝尔格莱德是一个频繁的中转站。虽然游击队不时被拘留，但这只是为了审讯，因为东德的特务们在努力跟踪西方的发展。

从东方的角度来看，这种态度可能在1975年正式形成，当时国家安全部（MfS或Stasi，东德政治警察）第二十二部门成立，表面上致力于防止恐怖主义，但实际上也参与了试图控制恐怖主义的工作。1尽管整个新左派对“东方”的反对声此起彼伏，而且MfS中的许多人认为西方壮观的武装行动妨碍了更平凡但也更重要的情报收集。事实上，正如John C. Schmeidel所解释的那样，资产负债表并不总是容易统计的：

东柏林的舍内费尔德机场，一个安全的过境点

偶尔，RAF的袭击让东部有机会了解联邦共和国在危机时刻是如何动员起来的，因为一架战斗机会故意绕过敌对空域的边缘，以判断对手需要多长时间来进行争夺。西方部门暴露了他们通常隐藏的秘密资产。另一方面，[MfS负责人马库斯·]沃尔夫和HVA2意识到，持续的警察警报和恐怖袭击带来的边境管制使其在边境上收集面包和黄油的工作生活变得艰难。3

鉴于这些考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77年，随着联邦德国实际上处于戒严状态，这种赌注已经完全不能接受。时至今日，仍有观察家认为民主德国破坏了人阵（EO）劫持兰茨胡特客机的行动，并被动地支持GSG-9对摩加迪沙的干预。例如，Stefan Wisniewski认为民主德国可能向南也门施压，不让劫机者有一个安全的基地来谈判交换人质的事宜。Till Meyer（原2JM成员）断言，Stasi向巴勒斯坦突击队提供了无害的哑弹武器，然后将这一事实转达给了联邦德国。



虽然这种说法纯属猜测，但随着事件的发展，确实有理由相信，游击队通往东方的桥梁已经被烧毁，就像其他许多桥梁一样。

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PDRY）的坦克阻止兰茨胡特客机进入跑道

1 John C. Schmeidel, *Stasi: Shield and Sword of the Par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52, 154.

2 The Hauptverwaltung für Aufklärung—MfS的对外情报部门。

3 Ibid., 159.

4 Stefan Wisniewski, *We Were So Terribly Consistent… A Conversatio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Red Army Faction* (Montreal: Kersplebedeb, 2008), 27. 关于南也门政府为何选择此时与西欧游击队拉开距离，众说纷纭。已故的Fred Halliday认为，PDRY之所以不愿参与，是因为他们曾同意为1975年2JM交换人质时释放的囚犯提供避难所，从而产生了影响。(Fred Halliday, *Revolut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South Yemen 1967-198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6-77.)

5 Schmeidel, 194, n.36.





在巴德尔、恩斯林和拉斯佩的葬礼上打出的横幅：“反对狱中死亡！反对空中劫持！和平归于贫民窟，战争归于宫殿！”

1. Joyce Marie Mushaben, From Post-War to Post-Wall Generation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the National Question and NATO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176-177.

2. 根据大多数人的说法，这起谋杀案构成了西德1960年代一代人叛乱诞生的决定性时刻。2009年，这个故事出现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几乎无法想象的转折，记者发现了杀害欧内佐格的警官Karl-Heinz Kurras的证据，他当时是史塔西的线人，也是东德SED的秘密成员。

3. Irmgard Möller, interviewed by Dagmar Brunow and Luka Skywalker, “Zur Mythenbildung nicht geeignet,” Testcard, May 12, 2003.

4. 如此多的纳粹分子持续掌权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正如RAF囚犯Lutz Taufer后来解释的那样：“在奥斯威辛和越南的背景下，与这些力量一起起义，甚至在中央拿起武器，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是合理的。政客、财政、司法系统、军队与法西斯过往的模糊关联系，以及他们支持越南种族灭绝的明确立场，使得法西斯主义能否在德国悄然回潮成为一个开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联邦共和国的武装斗争是一种迟来的抵抗形式。”(Karl-Heinz Dellwo, Knut Folkerts, Lutz Taufer, Thomas Ebermann, Rosita Timm, and Hermann L. Gremliza, “Sie wollen uns auslöschen,” konkret June 1992).

5. Mushaben, 167. 正如RAF成员Rolf Clemens Wagner后来所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对越南战争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Helmut Pohl and Rolf Clemens Wagner, interviewed by junge Welt, “Wir wollten den revolutionären Prozeß weitertreiben,” junge Welt, October 17, 2007. This interview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is available at http://www.germanguerilla.com/red-army-faction/documents/07\_10.html.)

6. Knut Folkerts, interviewed by Wolf-Dieter Vogel, “Im Politik-Fetisch wird sich nichts Emanzipatives bewegen lassen,” Jungle World, October 1997.

7. RAF, “The Black September Action in Munich: Regarding the Strategy for Anti- Imperialist Struggle,” in André Moncourt and J. Smith, The Red Army Fac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Vol. I: Projectiles for the People (Oakland: PM Press, 2009), 222- 223.

8. 由于创造性的页面设计，虽然该文本最初的标题是“城市游击队和阶级斗争”，但它更多地被称为“为人民服务”，尽管这实际上是作为原始文件的副标题。

9. All three of these texts are available in English in our first volume, and also on the German Guerilla website, www.germanguerilla.com.

10. Christian Klar, interviewed by Günter Gaus, “Günter Gaus im Gespräch mit Christian Klar,” Angehörigen Info, February 15, 2002.

11. 由于其名称中无处不在的“K”（代表“共产主义”）而被称为K团体，是那些从APO的衰落中出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党前组织。

12. Helmut Pohl and Rolf Clemens Wagner, interviewed by junge Welt.

13. RAF, “The Urban Guerilla Concept,” in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97.

14. Allensbach Opinion Poll, published in Spiegel, July 26, 1971.

15.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163-169. 16. Ibid., 170-172.

17. 在德国使用的表述是先写城市名称，然后写监狱的名称，通常是监狱所在街区的名称。因此，科隆-奥森多夫指的是科隆市奥森多夫区的监狱。

18. Friends of Astrid Proll, Astrid Proll: The Case Against Her Extradition (London: 1978), 8.

19. Stefan Aust, The Baader-Meinhof Group: The Inside Story of a Phenomenon,

translated by Anthea Bell (London: The Bodley Head Ltd., 1987), 246.

20. 正如Rolf Clemens Wagner后来回忆说：“我的经验是——我从其他囚犯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话——人在绝食期间感觉最好。不是身体上的感觉，而是因为人是积极的，与他人团结奋斗的。”（Helmut Pohl和Rolf Clemens Wagner，接受junge Welt采访）。或像Karl-Heinz Dellwo曾经说过的那样，“通过绝食，我们超越了折磨人的现实，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了主体。”

21.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253-254.

22.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Gunmen Kill German judge,” Hagerstown Morning Herald, November 11, 1974.

23. RAF, “Letter from the RAF to the RAF Prisoners,” in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338.

24.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332-335.

25. 将RAF分为“几代”的做法在当时受到游击队及其支持者的抵制。用克里斯蒂安·克拉尔的话说，“‘几代’，那从来不是我们的理解。那是基于追溯我们的人的需要，在1972年或1977年之后，他们不得不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被‘打垮’之后，它仍在继续。相反，我们必须通过实际的阶段和政治局势的变化来工作。”(Christian Klar, interviewed by Süddeutsche Zeitung, “Die RAF gehört in eine ganz bestimmte Zeit…” Angehörigen Info 194, May 16, 1997). See also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336.

26. Ibid., 181.

27. Helmar Büchel and Ulrike Demmer, “Krieg der Lügen,” Spiegel, April 11, 2009. 这样的心理战技术绝不是西德独有的——相反，此时它们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标准配置。这在美国也许有最好的记录，1971年，活动家们闯入宾夕法尼亚州媒体的联邦调查局外地办事处，抢走了详细记录联邦调查局COINTELPRO项目的文件。当然，当面对这些活动的证据时，国家的首选策略是掩饰和淡化。因此，2009年，当《明镜周刊》就BKA的肮脏伎俩问题联系黑罗尔德时，他只是承认他可能写了这样一份文件，但声称不记得任何实施该文件建议的实际案例。前巴登-符腾堡州LKA主席Kuno Bux曾在1975年与警方和宪保局（Verfassungsschutz）会面讨论过这份文件，他坚持认为“我们放弃了虚假信息的概念，因为它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不可行。”

28. Ibid.

29. 应该指出的是，即使他们谴责这是禁止他们参加诉讼的透明举措，但囚犯们坚持认为，他们不适合接受审判是因为隔离条件，而不是绝食本身。

30. Sebastien Cobler, Law, Order and Politics in West German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78), 207.

31. Gerard Braunthal, Political Service and Public Loyalty in West Germany: The 1972 Decree Against Radicals and Its Consequence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0), 160-161.

32. Philip Jacobson, “Show Trial,” Sunday Times Magazine, February 23, 1975, 21.

33. Deutsche Welle [online], “Journalists Unearth Rare Terrorism Trial Tapes from 1970s,” July 31, 2007.

34.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rban Guerilla Leader Hangs Herself in Cell,” The Hayward Daily Review, May 10, 1976.

35. Winnipeg Free Press, “Uneven Contest,” May 19, 1976.

36.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441-443. 37. Ibid., 381-388.

38. 在本书中，我们将用“RAF囚犯”来表示以前曾在RAF中活动后被抓捕的人。应该牢记的是，囚犯（以及RAF）始终清楚，一旦被俘，游击队员就不再是RAF成员。正如伊姆加德·莫勒所解释的那样，“当你被逮捕，不再有武器，你可以尽可能地在地面上活动，鉴于你已经被俘，你就不能再作为RAF的成员进行斗争。你仍然是这一切的一部分，尽管不再是该组织的一部分。”(“NDR/Arbeiterkampf Interview mit Christine Kuby, Irmgard Möller, Hanna Krabbe und Gabriele Rollnik, May 16, 1992,” in ID-Archiv im Internationalen Institut für Sozialgeschichte/Amsterdam, wir haben mehr fragen als antworten: RAF diskussionen 1992-1994 [Berlin-Amsterdam: Edition ID Archiv, 1995], 33-46.)

39. RAF, “The Assassination of Attorney General Siegfried Buback,” in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490.

40. Jürgen Dahlkamp, Carsten Holm, Sven Röbel, Michael Sontheimer, and Holger Stark, “Operation Zauber,” Spiegel, July 9, 2009; Michael Sontheimer, “Logik des Krieges,” Spiegel, May 14, 2007.

41. 波尔和贝尔于1974年2月4日与Ilse Stachowiak、Margrit Schiller、Eberhard Becker、Christa Eckes与Kay-Werner Allnach赫一起被捕。霍佩三年前在与警方交火后被捕。

42. Spiegel, “Sicher gestört,” February 27, 1978.

43. Holger Meins, “Holger Meins’ Report on Force-Feeding,” in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293.

44.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259.

45. Frankfurter Rundschau, August 15, 1977, quoted in “The Stammheim Deaths,”

Cienfuegos Press Anarchist Review, no. 4.

46. RAF, “The Attack on the BAW,” in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496-497.

47. Jan-Carl Raspe, “Statement Breaking Off the Fifth Hunger Strike,” in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495.

48. See the RAF’s explanation to this effect on pages 246–247.

49. RAF, “The Schleyer Communiqués,” in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498.

50. On the PFLP (EO), see the sidebar on page 23, and also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559-561.

51. 舒曼曾被发现发送关于机上情况的密码信息，在南也门紧急降落后，游击队允许他离开飞机，以便迅速检查飞机是否损坏，但他在一个多小时内拒绝回来，在此期间，他与安全部队沟通了情况。舒曼被追授德国联邦十字勋章，不莱梅的汉莎航空飞行员学校以他的名字命名，巴伐利亚州兰茨胡特市的一条街道也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架被劫持的客机被称为兰茨胡特，Landshut。）

52. Karl-Heinz Weidenhammer, Mord oder Selbstmord? Das Todesermittlungsverfahren: Baader, Ensslin, Raspe, (Kiel: Malik Verlag, 1994).

53.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inconsistencies and irregularities in the state’s version of events, see Moncourt and Smith Vol. 1, 511-520.

54. 虽然受到接触禁令的限制，但莫勒被转移到少数几个没有切断监狱广播连接的牢房之一。在与前TAZ记者Oliver Tolmein的长篇采访中，她解释说，她有一副耳机，可以连接到监狱广播，有时可以听到新闻。(Oliver Tolmein, RAF—Das war für uns Befreiung: Ein Gespräch mit Irmgard Möller über Bewaffneten: Kampf, Knast und die Linke [Hamburg: Konkret Literatur Verlag, 1997], 100.)

55. Irmgard Möller, interviewed by Manfred Ertel and Bruno Schrep, “Irmgard Möller: Ich will nicht anders leben,” Spiegel, May 5, 1992.

56. Monika Berberich, interviewed by Initial, “Interview zur Geschichte der RAF,”

Initial, October 6, 2002.

57. Associated Press, “German Leftists, Police Battle after Paper Raided,” Waterloo Courier, October 24, 1977.

58.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Crusade Against Terrorism Urged,” Newport Daily News, October 25, 1977.

59. Margit Mayer, “The German October of 1977,” New German Critique 13 (Winter 1978): 155.

60. Braunthal, 162.